

全球跨境投资变化情势预判及应对

■ 王 婧

摘 要：研究掌握全球跨境投资的演变规律，不仅可为我国企业进行跨境投资活动时，及时捕捉市场动态，了解投资热点和潜在风险，规避政策风险提供参考；还有助于我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争取在国际投资规则设置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全球跨境投资的现状和行业投资特点，预判至 2035 年全球跨境投资的总量和结构变化，剖析影响全球跨境投资结构和流向变化的背后原因，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关键词：全球跨境投资 情势预判 跨境投资治理规则

跨境投资是资本、技术、产业、商品乃至文化和规则在区域及国别间流动的载体，它不仅促进了资源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还带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和兴盛，是推动产业在全球分工布局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经济正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深度衰退中缓慢恢复，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政策阴霾时有抬头，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危机又加剧了全球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使得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愈发脆弱，导致全球跨境投资者的预期下调，投资信心恢复艰难。

一、全球跨境投资现状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发布《世界投资报告 2024》显示，2023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为 1.3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2%。欧洲除爱尔兰、荷兰、比利时、瑞士等“管道”经济体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外，其他欧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跌 14%，北美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跌 5%，其余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基本陷入停滞。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同比下跌 7%，至 8670 亿美元。引人关注的是，最不发达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2.4%。

从跨境投资方式来看，2023 年国际项目融资以及跨国并购表现疲软。跨国并购是发达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23 年跨国并购额同比下降 46%；而发展中国家较依赖的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国际融资也同比下降 26%。绿地投资项目一改此前 10 余年的持续下跌趋

势，项目金额同比增长 15%。

从跨境投资行业来看，2023 年新增的绿地投资项目主要聚焦于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在制造业和关键矿产开采、加工领域方面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金额大幅增加；汽车制造、电子元件、机械工业等价值链密集产业，国际直接投资显著增长；但在数字经济、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金额有所下降。

二、全球跨境投资变化形势(2024-2035 年)

(一) 全球跨境投资流量将呈现倒“U”型走势

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 1970-2023 年全球 FDI 流量值，来推测 2024-2035 年的全球 FDI 流量值，选用自回归移动平均(ARMA)模型，运用 EViews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煤炭战略功能定位与测算”(编号：23BGL014)、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资助项目“‘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研究”(编号：XQ2023003)阶段性成果。

软件进行建模测算。经过多次参数推演测算，确定 ARMA 模型的系数为 ARMA(2, 1)，据此模型可递推估算出 2024-2035 年全球 FDI 流量值的预测值。预测曲线结果呈倒“U”型长尾走势，先缓慢上升，于 2027 年左右达到小高峰，然后缓慢下降，呈长尾走势，2030 年左右下降速度更趋平缓，之后 5 年中又有一个小高峰出现。

(二) 跨国公司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布局将由离岸向在岸、近岸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引起各国对海外产业链安全问题的关注和担忧。美、日等国率先推出使制造业回归本土的一系列政策，跨国公司纷纷对母国的这些政策做出反应，并慎重评估离岸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当前随着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加快，也使得不少原有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逐渐摆脱劳动力密集产业的成本约束，在岸、近岸布局替代“中心--外围”式离岸布局成为可能。

(三) 跨境投资治理规则主导权之争将愈加激烈

美国和欧盟两大经济体试图通过主导一系列多边和诸边协议，“抢占”全球投资规则制定先机，如通过制定《2012 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等试图影响并主导未来全球的投资规则。而

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因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诸多差异，迫切需要适合自身实际发展情况的、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韩自贸协定》中，均对投资议题单独设章，与发达国家主导的投资规则有诸多不同。国际投资规则的主导权之争将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博弈的焦点之一。

(四) 跨境投资治理规则议题将不断深化

国际投资规则主要涉及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保护两大类。目前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促进投资自由化的模式等方面，根据实际情况发展都有诸多创新。如伴随着国际投资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经历了从国家本位阶段到投资者本位阶段的积极转变，仲裁程序更加灵活，解决过程也更为透明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投资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减少了主权国家之间因投资者利益而产生的诸多摩擦。

三、影响全球跨境投资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 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将人类社会推向全新的发展阶段，深刻改变

了全球跨境投资的流向和布局。伴随着数字经济、信息网络技术的蓬勃兴起，跨国公司进行跨境投资决策时，地理距离、市场容量等因素的重要性降低，而东道国是否具备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和研发资源的实力潜力、环保要求和社会责任规范等将渐成重要考量因素。此外，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将助推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往往带来跨境投资流向和结构的深刻演变，因此，跨境投资者会紧跟市场趋势不断调整自身投资策略，将资金投向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

(二) 全球化的结构性调整

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趋势凸显，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全球供应链空间布局加速重构，经济贸易格局深度演化，深刻影响全球跨境投资的结构和流向。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出台制造业回流、进口替代关税、海外投资限制等政策，筑起“小院高墙”，以产供应链“安全”为名，说服本土跨国公司降低对“意识形态差异”国家的投资，或者积极寻找替代国家，通过对产业链某些环节跨区域备份、缩短供应距离、增加供应链多样性等来分散风险，不少跨国公司纷纷制定新的投资规划来迎合母国的政策举措。

（三）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事件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往往导致投资者对市场前景的担忧，进而影响其投资信心和风险偏好。当国家间关系紧张或冲突升级时，投资者可能会重新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而调整其投资布局，选择减少跨境投资或重新评估投资组合，以规避潜在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导致国际资本从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撤出，回流至相对安全的国家和地区。这种资本流动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

（四）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往往通过增加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如配额、技术壁垒等）来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这些措施会提高外国

投资者的产品进入目标市场的成本，从而降低其投资回报率；还可能带来政策风险，即外国投资者担心目标市场的政府突然提高关税或实施新的贸易限制措施，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更加谨慎，甚至可能选择撤资或转向其他市场，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五）核心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

“全球流动性”作为衡量全球资金供给的指标，被认为是驱动跨境资本流动的最重要因素。而“全球流动性”与储备货币发行国/地区（美国、欧洲、中国、日本、英国）的货币政策有密切关系；同时，核心国家的财政政策也会对跨境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以2018年美国的税改政策为例，由于税收政策的刺激，

美国企业开始将大量海外留存收益汇回，导致2018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大幅下降，其中流向欧洲和北美的外资分别下降73%和13%。

四、应对策略

（一）积极改善我国引资环境，提升引资质量和水平

一是继续完善我国的招商引资政策。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 革，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确保外资企业享有政策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与内资企业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同时，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侵权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针对国家重点招商产业和领域，出台更具吸引力的专项政策，如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用地保障等，以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项目落地。鼓励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设立投资性公司、地区总部等，深入实施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境内投资试点。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建设。加大对交通、通讯、能源、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提高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和承载能力，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生产经营条件，以龙头企业为主体，通过以商招商的方



式，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将规模化、系统化的产业配套能力转化为核心竞争优势。三是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吸引优秀外商人才来华。对外商高级别管理人员和高精尖技术人才开设绿色签证通道，提高往来便利化程度。建立健全外商人才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等方面的便利和支持。

（二）更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提高我国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

一是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强化对国际市场的调查研究。建立健全企业海外信息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国际市场、把握商机。二是做大做强资本要素市场，形成链接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鼓励金融机构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and 市场竞争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路径，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区域结算，提高我国金融服务的国际化水平，为我国企业“出海”提供性价比高、安全有保障的资金保险支持。三是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加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型开放，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经济合作区等方式，加强与

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产业等方面的合作与联系，进一步提高“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创新完善“一带一路”投资引资规则体系，注重提高投资的效益和质量，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三）总结归纳我国在投资引资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为全球跨境投资规则的制定贡献中国智慧

一是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重构，争取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发展需求。深刻理解和接纳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可持续发展的宽范围、高标准投资规则体系的理念。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包括多边投资协定、区域投资协定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等；前瞻性思考全球投资自由化问题及我国的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平衡发展的理念体现其中。二是加强与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加大与其他国家的多边投资合作。如加强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发展，在多边投资协定创初期即应积极准备加入研究工作，并尝试施加影响，避免错失“创始红利”。同时，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区域投资协定的谈判

过程。三是加快国内制度型开放的步伐，积极与国际规则深度对接。国家立法是国际投资规则得以实施的基础，我国应根据自身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发展水平，修订或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适应数字时代投资规则变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尽力做到与国际通行投资规则相衔接。特别是在与跨境投资相关的审批、监管、服务等方面，争取为外资企业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和政策体系。同时，建立完善的外资投诉协调处理机制，及时有效地解决外资企业在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参考文献：

[1] 王婧. 新时期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机遇、挑战及应对 [J]. 中国发展观察, 2024(5): 61-66.

[2] 张智. 外资准入 40 年：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 [N]. 华夏时报, 2018-07-30.

[3] 张健. 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及中国的选择 [J]. 战略决策研究, 2020, 11 (4).

[4] 王珂. 吸收外资，我们更加有魅力 [N]. 人民日报, 2018-07-16.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责任编辑：张莉莉